

生活在低处 飞行去远方

诗歌创作的三重维度

◎ 方忠

从街巷的奔波日常到新获鲁奖,“外卖诗人”王计兵以数十年笔耕不辍的创作,走出了一条扎根底层生活、直面时代境遇的诗歌道路。其诗集《赶时间的人》《低处飞行》《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以亲身经历为底色,书写灵活就业时代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坚守。在当代诗坛部分作品陷入脱离现实、晦涩空洞的困境之时,王计兵的创作以朴素真诚打破文学与大众之间的隔阂。下面,我从时代与现实、温度与力度、大众化与文学性三个维度出发,剖析其诗歌的思想内涵与审美特质,探寻底层劳动者书写的诗学路径与现实意义。

◎ 编者按

鲁奖之后,新大众文艺往何处去?如何评价这些“根植劳作、书写人间”的作品?9月1日,《徐州日报》08版刊登了3位徐州文艺评论家、作家对这一课题的回应,本期专题将继续这一课题的探讨。

“外卖诗人”王计兵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自己从事过的岗位中,外卖员是他最喜欢的,骑在电瓶车上,听着耳边呼啸而过的风,可以体会到一种飞翔般的自由。

王计兵的创作始终立足行业现场,“低处飞行”是他创作的态度和姿态;也正是这种无可替代的“在场感”,他的《低处飞行》被时代看见。

人人都是生活的主角。每一位扎根生活的普通人,都可以书写个人、记录时代,让真实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自然流露,这是新大众文艺最打动人地方。借用王计兵的文字,就是“生活在低处,飞行去远方”。

张瑾 组稿

时代与现实

时代是诗歌生长的土壤,现实是诗歌创作的根基。王计兵的诗歌创作紧扣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变迁,把自身外卖骑手、农民工、普通劳动者的经历,化作映照时代的文字,以个体的生命体验折射新时代灵活就业群体的集体境遇,形成了对时代和现实的忠实记录与艺术呈现。

在数字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成为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他们却长期处于话语表达的边缘地带。主流文学创作中,底层叙事往往是知识分子远距离的观察与想象,缺少身处其中的切身感悟,难以真正触摸劳动者的真实困境。王计兵本身就是外卖骑手群体的一员,做过建筑工人、拾荒者、小商贩,半生辗转奔波于城乡之间,饱尝底层谋生的艰辛。这让他拥有旁人无法复刻的现实素材。代表作《赶时间的人》便是时代现实书写的典范之作:“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诗句精准捕捉到平台算法裹挟下外卖骑手争分夺秒的生存状态和现实困境。四季轮转对普通人而言是时序更迭,对外卖骑手而言只剩下接单与送餐的站点切换。这首小诗没有宏大叙事,却勾勒出数字经济时代底层劳动者被时间裹挟、被动前行的时代缩影。

王计兵对时代与现实的书写,不只停留于外卖行业,而是延伸到城乡转型的广阔现实之中。在《父亲从乡下来看我》里,他以细腻视角书写城乡二元结构下父亲处境:“从六楼望下去,父亲就像五彩画布上一滴墨,他在那里旋转,手足无措地找不到应该着落的位置。”乡村耕耘一生的父亲走进钢筋水泥的城市高楼,陷入无所适从的茫然,渺小得如同城市可以忽略的尘埃。这首诗呈现了城镇化进程中乡土与现代城市的隔阂,书写了千万农民工进城之后的生存困境,把个人亲情体验上升到时代转型的社会命题。诗集《低处飞行》收录的诸多篇章,聚焦外卖站点、城市街巷、城中村角落,记录灵活就业群体的喜怒哀乐,用诗歌为沉默的新打工群体发声,填补了当代诗歌对数字经济平台时代劳动者书写的空白。

温度与力度

温度与力度构成王计兵诗歌的双重审美特质。温度是根植于人性的悲悯与善意,是对家人、同行、普通人的体恤与共情;力度是直面生存苦难的坚韧力量,是底层生命历经生活打磨之后迸发的精神锋芒。温情消解苦难的冰冷,力量支撑精神的挺立,二者交融共生,让王计兵诗歌既有抚慰人心的柔软质感,又拥有穿透现实的硬朗风骨。

诗歌的温度,源自王计兵对日常生活细微善意的捕捉,对平凡人间烟火的深情眷恋。半生饱经生活磨难,他却没有被苦难磨去善良本心,反而以宽厚包容的视角看待周遭世界,在困顿日常里打捞细碎的温暖。

诗集《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同名诗作是温情书写的经典篇章:“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断掉的沙发腿。”家境清贫的夫妻面对二手旧沙发依旧满怀欢喜,在简陋的生活条件里认真经营日常,朴素的细节里满是生活的暖意。对待同为外卖骑手的同行,王计兵也饱含共情,在诸多诗篇里书写骑手群体彼此帮扶的瞬间:暴雨天互相提醒路况、超时之后彼此宽慰,在高压奔波之中守望相助。他没有聚焦个体的自我诉苦,而是关照整个底层群体的处境,以悲悯之心看待世间所有奔波谋生的普通人,让诗歌扎根烟火人间,拥有包容世间众生的人文温度。

诗歌的力度,则来源于现实苦难淬炼出的生命韧劲,直面生存困境的清醒与坚定。王计兵的生活布满坎坷,早年务农、外出务工、拾荒谋生,中年转行外卖骑手,长期在城市底层艰难求生。生活给予他的重压没有将其击垮,反而化作诗歌文字里坚韧的力量。《赶时间的人》中,诗人把生活磨难比作锻造的过程,外卖骑手日复一日的奔波劳碌,便是肉身历经苦难打磨的过程。苦难不再是纯粹的折磨,反而锤炼出顽强的生命意志,在重压之下依旧挺直精神脊梁。面对平台时代零工经济的生存压力,他没有消极抱怨,而是承认现实的残酷,依旧坚守劳动的尊严。王计兵诗歌的力度不是激昂慷慨的呐喊,而是内敛沉静的坚韧,如同沉默生长的草木,扎根贫瘠土壤,依旧顽强向上生长,在平淡的文字中积蓄撼动人心的力量。

温度与力度在王计兵的诗歌中相互依存、辩证统一。倘若只有温度没有力度,诗歌容易陷入软弱感伤的诉苦;倘若只有力度缺少温度,文字会变得冰冷生硬。他以温情消解苦难带来的戾气,用坚韧抵御现实带来的消磨。在描写送餐遭遇委屈、被顾客误解、被平台处罚的困顿时刻,他没有一味宣泄愤怒和怨恨,而是理解生活之中每个人都有自身难处,以包容的温情看待世事;同时,即便感知生活的艰辛,依旧保有不屈服的生命力量。温情让力度变得温润厚重,力量让温情拥有坚实支撑,二者交融,让诗歌既可以抚慰疲惫的心灵,又能够给予普通人直面生活的勇气。

大众化与文学性

长期以来,当代诗坛存在大众化与文学性割裂的困境:部分诗歌一味追求晦涩的先锋实验,繁复的修辞技巧,脱离普通大众的阅读体验,造成文学与读者之间的隔阂;部分通俗写作一味迎合大众趣味,缺少文学审美提炼,沦为浅层日常记录。王计兵的诗歌创作打破了二者对立的僵局,以大众化的通俗表达贴近普通读者的审美习惯,同时在朴素日常语言之中提炼诗意内涵,实现大众化传播与文学性审美二者的平衡统一。

大众化特质体现在语言通俗直白、题材贴近生活、情感真诚直白三个层面。王计兵没有接受系统的学院文学训练,没有刻意套用诗歌现成的创作套路,摒弃晦涩的意象与繁复的修辞,采用口语化、生

活化的日常语言进行书写。其诗歌句式简短直白,用词朴素平易,普通读者无需文学专业知识,便可以读懂诗句表达的内涵。《赶时间的人》的走红,正是大众化特质带来的传播效果。上班族、农民工、服务业从业者,都可以从诗句之中看见自身被时间催促、为生活奔波的影子。王计兵创作题材聚焦普通人的日常琐事,选取大众熟悉的生活场景进行创作,拒绝书写脱离日常的宏大命题。在互联网传播环境之下,通俗直白的口语诗歌更容易突破圈层传播。

文学性并非只存在于繁复的修辞、深奥的哲理之中,朴素的日常语言同样可以提炼文学美感,构建独特的诗歌美学,这是王计兵诗歌创作的重要突破。其诗歌语言看似平实直白,实则经过精心提炼打磨,在口语化表达之中运用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把日常物象转化为富有诗意的文学意象。《低处飞行》以“飞行”比喻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即便身处低处,依旧拥有向上生长的姿态,意象简洁却意蕴深远。王计兵擅长以小见大,从细微的生活片段提炼普遍性的生命哲理,日常送餐的街巷、父亲佝偻的身影、破旧的沙发,普通生活场景经过文学提炼,具备超越日常本身的审美内涵与思想深度。在结构层面,诗作节奏简洁凝练,句式长短错落,语言干净克制,简单的文字之中蕴藏悠长的回味空间。此外,其诗歌具备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质感,以真切的生命体验构建文学审美,在平实文字之中蕴含沉静厚重的诗意,构建出独特的底层诗学美学,完成大众化基础之上的文学升华。

大众化与文学性在王计兵的创作中相辅相成,大众化是文学性的现实根基,文学性是大众化的审美升华。大众化让诗歌摆脱象牙塔的禁锢,扎根民间生活土壤;文学性让通俗日常书写摆脱浅层流水账式的记录,具备长久留存的审美价值。他没有为迎合大众走向通俗浅薄,也没有因追求文学性走向晦涩高冷,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支点,开辟出崭新的诗歌创作路径。

王计兵的诗歌创作,以时代与现实为创作底色,以温度与力度构建情感内核,以大众化与文学性平衡审美表达,走出了一条扎根底层现实、贴近普通民众的现实主义诗歌道路。在时代层面,他以亲身经历记录数字经济时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生存境遇,为流动时代的普通劳动者留存文学记忆;在情感层面,他以悲悯的温情观照人间烟火,以苦难淬炼坚韧的生命力量,让诗歌兼具柔软与刚健的双重特质;在文学审美层面,他打破大众化与文学性相互割裂的困境,用通俗日常的口语书写提炼深沉诗意,让文学回归生活本身。

王计兵的创作给当代诗坛带来重要启示:诗歌只有扎根现实生活、倾听底层心声、关照普通民众的生存体验,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未来,随着创作持续沉淀,其诗歌可以进一步拓展思想视野,在扎根现实的基础上完成更高层次的文学提炼,持续拓展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边界,为当代底层文学书写提供更多可借鉴的经验范式。王计兵用自身创作证明,烟火人间的普通日常,永远是文学创作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作者为徐州市作协主席)

作为“外卖诗人”王计兵,以《赶时间的人》《低处飞行》等诗作进入大众与文学界视野。尤其是其近作《低处飞行》荣获鲁迅文学奖,成为新大众文艺写作的引领者与示范者。

他的写作,区别于书斋写作、旁观式底层叙事;他的诗歌根植于数十年劳作的肉身经验,真诚是其文本根基,性情是精神内核。其真诚体现为生存现场的如实书写、拒绝刻意煽情的叙事分寸、发自内心的生命体察:性情则表现为困于生计而不失悲悯、身处低处依然保有诗意向往,兼具劳动者的坚韧、普通人的柔软与乡土赋予的温厚。真诚使其诗歌拥有不可复刻的现实质感,性情赋予文字超越苦难的精神光亮,二者交融,接续中国古典“劳者歌其事”的文学传统,也为新时代打工诗歌开辟出新的审美路径。

生活的原生态:真诚,扎根生存现场的写作本源

王计兵的优势在于,他本身即是书写对象,所有诗句诞生于电动车穿行街巷的间隙、暴雨中赶路的疲惫、等待订单的片刻闲暇。烟盒、废纸张、手机备忘录成为他的稿纸,文字自带汗水、风雨与市井烟火的温度,这种源于亲身经历的真实,构成诗歌真诚的第一层底色。诗人不凭空想象奔波之苦,而是把长期跑单形成的身体感知转化为意象:风如同刀刀,日复一日的奔波如同持续淬火。他如实记录数字时代新业态劳动者独有的生存景观:倒计时、罚单穿梭的电梯、深夜写字楼零散的订单。这些独属于外卖骑手的真实谱系,不是文学技巧的堆砌,是日复一日目之所及、身之所感的日常。更深一层的真诚,是情感表达上的克制与客观。王计兵不宜泄怨怒,不控诉命运。饱尝谋生艰辛,他极少在诗中放大痛苦。除此以外,他诗歌中面向自我的坦诚,亦是真诚的重要维度。他书写乡愁、与故土渐行渐远的怅惘,书写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与愧疚,直面漂泊者无处安放的身份焦虑。

低处的光芒:性情,苦难之中舒展的精神人格

倘若仅有生活实录,诗歌只能停留在生活记录。性情,让琐碎的日常升华为诗。王计兵的性情,是根植于人格、渗透全篇的精神气质:谦卑而倔强,悲悯而通透,深陷生活低处,依旧保留对世间万物的善意与诗意感知。“低处飞行”是他重要的精神宣言:双脚踏于城市地面,精神却始终渴望飞翔。

日复一日机械重复的劳作里,他坚持捕捉诗意。车轮、路灯、细雨、行道树,寻常事物在他眼中拥有独特光芒。“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这句广为流传的诗句,正是诗人性情最好的写照。王计兵的性情自带乡土培育的仁厚。他的目光不只聚焦自身命运,更愿意看见所有奔波者的悲欢。他理解城市的冰冷规则,同样珍惜偶然闪现的善意,以温和眼光看待复杂人间,少有偏激、对立的评判。这份宽厚性情,使他的底层书写跳出阶层对立的简单叙事,具备更强的人性深度。游走城乡之间,他持续感受乡土消逝带来的失落,不断在城市寻找精神故乡。一面适应都市快节奏生活,一面守护来自乡村的淳朴心性。刚硬的谋生现实与柔软的内在情感彼此交织,构成诗歌丰富的张力。外在是风雨兼程、不停赶路的骑手,内心是念及故土、牵挂家人的普通人,刚柔并存,正是性情立体的体现。

可以说,真诚与性情共同构建起王计兵诗歌的审美价值。真诚是容器,承载性情;性情是内核,激活真诚。若无真诚打底,性情极易沦为空洞抒情和无病呻吟。很多诗歌抒发悲悯、向往、坚韧,但是缺少真实生命体验支撑,情感漂浮空洞。王计兵所有的温柔、倔强、乡愁,全部扎根真实生存体验,情感落地可感。反过来,倘若只有客观真实的记录而缺少性情灌注,文字只会沦为生活流水账,无法完成从现实到诗的跨越。正是诗人独特的心性、共情能力、对美好的执着向往,让街巷见闻、奔波日常脱离单纯纪实,拥有精神感染力。将王计兵置于当代打工诗歌脉络中观察,更能看见二者融合的意义。早期打工诗歌多侧重工厂苦难、城乡冲突,抗争色彩浓厚。王计兵拓展了打工书写的边界:他书写数字时代新劳动者的生存图景,弱化尖锐对抗,着力挖掘平凡生命内部的丰富性。依靠真诚,他守住现实文学的根基;依靠性情,他实现对生存困境的诗性超越。他证明:底层诗歌不必只有悲愤,普通人同样拥有细腻丰富的精神世界;劳作与审美并不对立,奔波谋生之人,依然拥有有诗写、感受美好的权利。

就新大众文艺写作实践而言,徐州有以工业诗歌为背景写作的诗人绳子;有以讴歌故土情怀的农民诗人姚刚;有以故黄河为背景书写个人生命体验的胡皓彦;有以村落文化为背景的诗歌村的写作实践;还有以农贸市场为生存、生活根据地写作的诗人刘梅等……总之,徐州新大众文艺创作的土壤是深厚的,人才储备是较为广泛的。相信,在王计兵的示范带动下,徐州文学创作内容的丰富性、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将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作者为徐州诗人)